

前 言

隋唐，继秦汉之后，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时期。汉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王朝，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至今仍以汉为族名。在当时的世界上，汉和罗马东西辉映，是两个最发达的帝国。由于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公元 2 世纪末，汉朝土崩瓦解，从此以后，在将近 400 年的岁月中，出现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北方的胡人利用中原政府软弱无力的机会，进入海河、黄河流域，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的浪潮。这种情形，和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几世纪的历史，颇有几

分类似的地方。

但是，中国与西欧不同，分裂状态逐渐得到了扭转，胡人也逐渐与原来的汉人（当时亦称晋人）融合。伟大的中国古文化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一统”^①的精神一直受人信仰。在分裂割据的时期中，豪杰之士无不努力探索重新统一的途径。可供口操种种方言的人通用的汉字无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 5 世纪后期北魏首创的均田制是一份满意的答案。封建国家计口授田，把大量农户掌握在国家手里，使皇权与豪强大族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统一就能压倒分裂。胡汉的融合又使汉族获得大量新血液，显得更有活力。

公元 6 世纪后期，时机成熟了，混一南北的隋朝终于诞生。这个新王朝辖有农民数百万户。每一个丁受一份田，缴一份租（粮食）、一份调（绢），服若干天徭役。政府又实行府兵制度，把一部分民户编入兵府，服兵役，从而保证了兵员的来源兵府的数目，腹心的地区多，边远的地区少，使中央政府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隋朝从北周沿袭下来的制度。此

“大一统”始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原文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是动词，意为尊崇一统。

外，隋朝首创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科举不仅是皇权团结整个地主阶级的办法，还向除从事几种被视为“贱”的职业以外的民户开放，欢迎他们的子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加入地主阶级的阵营。从隋朝起，公卿出身于寒士的史不绝书。这是一项大发明，它不断地扩大并加强统治的基础。

隋朝完全有可能长治久安，但是它同 800 年前的秦朝一样，二世而亡，共仅 38 年。父亲杨坚创业，儿子杨广便成为亡国之君。亡国的原因也一样，就是汉朝贾谊说的“仁义不施”四个大字（见《过秦论》上篇末）。历史的教训原极明白，可是有些人视而不见，老是犯前人多次犯过的错误，古往今来，岂仅隋人而已。

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隋王朝，从而为一个能对历史作出积极贡献的新王朝的诞生扫清道路。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这是明显的事实，谁也抹煞不了的。

唐朝诞生了。唐史可以分为两个段落。从公元 618 年到 755 年的唐朝前期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盛世，扣除了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消灭割据势力的几年，实有 130 年左右。公元 755 年以后是唐朝后期。

唐朝前期有许多为后人啧啧称赞的人物和事件。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之治堪称封建社会中政治清明的典范。

唐朝击败了突厥的侵扰后，比较妥善地处理遗留的问题，使突厥君长各得其所，并推动了北方各少数君长的向心力，使唐太宗得到了“天可汗”的称号。

唐朝不断地加强了和周围少数民族的联系，从太宗到高宗，吐蕃、回纥、南诏、渤海都和唐朝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从长远看，友好一直是主流。

唐朝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印度、波斯、大食都和中土展开文化和经济交流。大唐的声名如日中天，“秦王破阵乐”的盛名一直传到印度乌菟王朝戒日王那里（见本书《唐代前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章《玄奘法师和（大唐西域记）节》）。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中亚，以后继续西传，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罗、日本的使节、学生、僧人不断来到中国，热诚地吸收新知。亚洲许多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有人来到中国。

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的局面。火药已经初呈端倪，雕版印刷大概也是这样。药王孙思邈、天文历算名家李淳风、一行和尚等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上不朽的人物。诗，唐代文化成就最高的部门已经走进了黄金时代，律诗和绝诗的体裁完成了，王

(维) 孟(浩 然) 高(适) 岑(参) 李(白) 杜(甫) 诸家相继出现。书法、绘画、雕塑都美不胜收。

这真正是历史上的盛世，政治威望、军事实力、经济富裕、文化发展，四美兼具，并臻高峰，历代很少可以与之比拟。在第七八世纪中，环顾世界，只有大食（阿拉伯）帝国可与唐朝并驾齐驱，余子碌碌，都望尘莫及。这不是笔者偏爱本国的一孔之见，而是考察了当时世界实况后得出的结论。

然而，长治久安的局面突然中断了。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此后，唐朝的政局再也没有恢复全盛的状态。朝中党争迭起，宦官擅权；地方藩镇割据，竟无宁日。

突发的事变，究其来历，常有远因。唐和隋朝相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均田制是必然要消亡的。国家不掌握大量土地，就没有田可授给人丁。土地买卖的盛行，官僚地主的兼并，使可授的田越来越少，均田制势难维持。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均田制的实质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得住“丁身”，租庸调才有着落，府兵才编得成。封建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剥削日益繁重，这是阶级的本性使然，“圣君贤相”无法使之改变的。农民要摆脱束

缚，逃避赋税，办法首先是逃散。逃户、流民，历代都有，唐代的前期也有。政府抓不住丁身，赋役制度、兵役制度都乱了套。这个病根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已经很严重了，天宝（742—755）实在不是全盛的日子，富和强都是虚假的。所以安禄山一造反，唐朝几乎一下子就垮了。

军阀叛乱不得人心，安禄山和继承他的史思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唐朝也无力实现真正的中兴，因为唐朝的统治者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在没有均田制的前提下，怎样保持统一和集权。唐朝以后，宋、元、明、清都是没有均田制的统一王朝。唐朝后期正处于转折关头，统治者还没有找到办法。

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财，二是兵。

财的问题比较好办。租庸调制乱了套后，政府依旧征粮、征绢、征劳役，不过被榨取者未必是册籍上的丁，而是现存的丁。现存的丁的负担越来越重，势必逃亡，从而可供榨取的对象越来越少。其势不得不变。公元 780 年，理财家杨炎创立两税法，从“以丁身为本”改为“以资产为宗”，在农村中实行按亩征税，分夏秋两季缴纳的办法。这是划时代的改革，不仅解决了征税问题，并且放弃了由政府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办法。唐以后各代无不遵行。

兵的问题却很难解决。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政管得了兵则治，管不了则乱。府兵制的兵府不大，一个兵府的官长造不了反。大部队由许多兵府的将士组成，服役期满，或者把仗打完，就散还家乡。主帅出于临时指派，与将士没有深切关系，不可能带他们造反。因此府兵制出不了军阀。府兵制瓦解了，代替它的是募兵制。募兵以当兵为职业，有的还世代相传当兵。将帅长期带一支兵，有了长期的隶属关系，军队就成为将帅的军队。唐代后期藩镇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政府派别人去当主帅，不但指挥不动，还可能被赶走，甚至被杀死。政府自然有禁卫军。政府怕武将管了禁卫军，会尾大不掉，只得把它交给最亲近的奴才——宦官。哪里知道，掌握了兵权的奴才竟反仆为主，能够废立甚至杀害皇帝。

唐代后期的中央政府就是这样一天天垮下去，开头还有相当权威，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黄巢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唐代的统治。公元 884 年，起义虽以失败结束，唐政府的权威也近于丧失完结了。正像汉末一样，黄巾起义和凉州军阀董卓入洛阳以后的历史，不管修史也好，说评话、写小说也好，都把它算做三国史。884 年以后的唐史自然也应该让五代史去讲了。

唐代后期的政治史虽则很少光明面，文化史和经济史却完全不同，仍然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

文化方面，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唐诗。诗圣杜甫的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写成。唐代后期诗人名家辈出，各擅胜场。元稹、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一连串的作者争奇斗妍，各自留下许多传诵的名作。古文运动更是崛起于唐朝中衰之际，韩愈、柳宗元成为两大宗师。书法也是这样，颜真卿、柳公权的墨迹常为后人师法。绘画雕塑也继续昌盛。科技方面，雕版印刷品已开始流行，对火药的知识也比较成熟，快要把它送上战场了。

经济方面，当关中、河南北不断遭受战乱蹂躏时，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开始了。江南人民不仅在农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许多手工业，特别是制茶、磁器等方面有极可观的成就。扬州、成都等城市到唐代末年已经超过了长安、洛阳，而且突破了长安城坊、市各有严格区别的封闭性格局，同近代的城市有几分类似的地方了。

这是隋唐历史的简括的轮廓。下面就把它展开来讲述。

我国历史上第二次 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长期分裂状态的结束

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局面。从此之后，统一便成为历史的主流。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分裂割据的时期，然而总是支流。人民群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民有旋转乾坤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分裂的因素，使统一的中国，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项

极大的好处，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因为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有今天 10 亿以上人口的大国。

我们现在要讲的隋唐时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封建军阀取得胜利时起，400 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400 年的时间，可云长矣，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终究是暂时性的。这个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统一是我国历史主流”的规律。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个过程，汉末三国之后，西晋暂时统一了全国，然而十多年后就爆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混战。汉胡各族人民奋起反抗黑暗的统治。匈奴、鲜卑、羯(jié)、氐(dī)、羌等族的贵族却乘此起兵，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十几个政权。5 世纪 30 年代中，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才统一了黄河流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北齐代替了东魏，北周代替了西魏。最后，北周灭北齐，才统一了北方。南方的情形也很复杂。晋朝南迁，历史上叫东晋。后来权臣篡夺，陆续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无论从王朝的更迭，或地域的分合来看，这 400 年的历史，都是很混乱、很复杂的。

这种混乱复杂的状态，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封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主阶级中的豪强大族，占有了

广大土地，又占有了大量的部曲、佃客等依附农民。农民受到了豪强的管辖，便不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徭役。这便是分裂割据的经济基础。

少数民族的贵族建立了政权以后，总是利用本族人民的武力，压迫广大的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这样，在北方又有了严重的民族矛盾。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难以避免的。

事情很清楚 要恢复统一 必须改变经济基础的状态，也必须解决民族矛盾的问题。

人民坚毅不屈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 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在南北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中，在寂无声息地逃离豪强田庄的斗争中，农民坚决要求摆脱依附状态，分裂割据的经济基础逐步地被削弱了。各族人民赞成联合，反对互相的压迫。汉人和胡人并肩战斗，打倒压迫他们的各族封建主。汉人和胡人也互相交流生产经验，互相吸收风俗习惯，几百年下来，民族间的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这些变化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

封建统治阶级抗拒过这些变化，但是那些抗拒的集团和人们都失败了。北方的大族，象北魏时清河

崔氏的崔浩，想让大地主封公封侯，变成真正有土地有人民的世袭领主，做割据的诸侯。这种幻想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不受那些希望统一的普通地主的欢迎。结果是全族都被掌握政权的鲜卑贵族屠杀了。南方的大族，许多人把特权、地位、财富当做永远不会丧失的东西，逍遥自得，对于军国要事，世务得失，一概掉以轻心。结果刀兵一起，不管它来自起义的农民，还是阴险的野心家，这些富贵浮华之辈都束手就戮，毫无自全的办法。

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贵族只有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的一条前途。恩格斯指出：“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不愿意这样做的鲜卑贵族都被淘汰了，有些还是被自己人打倒的，因为有政治头脑的贵族也知道：顽固必然导致灭亡。

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变化的地主阶级政权，才能够存在，才有可能发展。北魏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把大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他们向封建国家缴租税、服徭役。政府握有的农户多了，皇权与豪强大族相比，占有了优势。统一的趋势就能克服分裂的倾向。北魏这么办，目的是要

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然而鲜卑族的皇帝之所以能够这么办，却是由于豪强大族被农民的斗争削弱了，他们要保持阶级利益，便不得不拥护以鲜卑贵族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

这部分比较开明的鲜卑贵族积极采取了汉化的措施。到 5 世纪末年，鲜卑人改汉姓，说汉话，跟汉人通婚姻，区别逐步消失。有些家族，象元氏（拓跋氏所改）、长孙氏（拔拔氏所改）等，从姓氏上还看得出是鲜卑族的后代；另外一些家族，象陆（步六孤氏所改）贺（贺赖氏所改）筹氏 就不免扑朔迷离，究竟是代北贵族的苗裔，还是汉族地主的衣冠门第，便颇费猜疑了。

这些变化为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公元 581 年春天，在北周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外戚杨坚^① 夺取帝位，建立隋朝，把当年改为开皇元年。杨坚便是隋文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政变原是极寻常的事情，但这次刚好发生在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时代需要创造一个新王朝和它的风云人物。隋文帝就是这样

杨坚是周宣帝的岳父，他废掉的周静帝是宣帝的儿子。

的一个人物；隋王朝的诞生就宣告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这时南方的陈朝衰朽没落，荒淫无道的陈后主（陈叔宝）专门跟妃嫔文臣游宴赋诗，任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刻剥百姓，把长江当做不可逾越的天堑，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个王朝当然不是隋朝的对手。

开皇九年（589）正月元旦的清晨，满天大雾，两路隋军在建康的东西两面悄悄地渡过了长江。

西面一路大将韩擒虎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采石，活捉酒醉昏睡的守军。这支兵突然在建康附近出现，竟象是从天而下的飞将军。东面一路，大将贺若弼久已在北岸经常调动人马，射猎喧闹。南岸陈军听惯了，不以为奇。这夜弄假成真，一举突破江防，进攻京口（今江苏镇江），与西路军会师建康。

正月初八，隋军打破建康。陈后主和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井里，被兵士搜出来，当了俘虏。陈朝所属郡县很快都归附了隋。岭南地方首领冼夫人是南朝梁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的寡妻，她统辖部落十余万家，实力很强。但是她一贯拥护统一，服从中原政府的政令。陈朝亡后，她立即派人迎

接隋将，于是广东一带也归入了新王朝的版图。

长期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了。

强大的新王朝

从汉末以来，在豪强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的条件下，封建国家要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必须直接控制更大量的土地和农民，确保租税、徭役和兵员的来源，确保皇权对于豪强大族的绝对优势。皇帝和豪强大族是一个阶级，但是在这一点上，却存在着矛盾。

隋朝继承北魏以来的制度 实行均田制 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依照开皇三年的法令，男子 21 岁为丁，算是全劳动力；一夫一妻叫“一床”，算做纳税单位；一夫受露田 80 亩，妇人 40 亩 另外每丁受永业田 20 亩 共计 140 亩。“一床”每年缴纳租粟 3 石，服徭役 20 天，纳绢 2 丈或布 2 丈 5 尺。如果农民照法令受足了地，照法令的规定纳税服役，负担是不太重的。但是从史书的记载看，有些农民只受了 20 亩地，那么即使实际负担不超过规定，已经很轻了。原来照当时统治阶级的观点，最最紧要的事情

是牢牢控制人丁，有一个丁，就责令他缴纳一份租税，服一定日数的徭役。人丁没有土地，就无法缴税服役，因此政府要授给他一份土地。这份土地的面积，法律上自然要有个规定，至于实际上给多少，那是另一回事。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均田制下的编户实际就是直属于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民。

国家掌握的农民越多，它的力量就越雄厚，因此，隋政府想尽办法来增加户口。隋朝初建国时，只有 360 万户光景，灭陈得了 50 万户，一共是 410 万户。难道 6 世纪末的中国只有那么一点点户口？难道长江以南只有寥寥几十万户？自然都不是的，事实上这仅仅是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户口，不包括豪强大族占有的户口，也不包括逃避赋役的农民。

隋朝政府规定：五家一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这三长制是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政府又定出“大索貌阅”的制度，根据年龄和容貌，详细检查户口，发现了隐瞒不实的情况，里正党长都要办罪。统治者用这套办法，清查被豪强大族非法占有的户口和逃避赋役的农民。

到了炀帝大业五年（609），人口增加到 890 万户、4600 多万口。这中间虽有自然增殖的数字，但主要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有了很大的增长。

除了抓住户口这一条外，新王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加强统一和集权的措施。

一是把用人和考选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三国曹魏在地方上设中正官，分九品（九等）选拔人员，叫做九品中正制。中正总是把世家大族的子弟列入上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从此大族几乎包办了高级官员，形成士族地主阶层。隋开皇十八年（598）下令废止流传 370 多年的九品中正制，结束了这个局面。隋朝的新办法是实行科举制度。科举是分科取士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取得官职。这在当时是打破高级士族垄断把持政局的积极措施。可惜记载有缺。它的始年，有人认为是开皇七年（587），有人认为在炀帝大业年间。据杜佑《通典》的说法，大约在大业三年（607）。究竟哪一种说法对，难以确定了。

一是削弱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江南的士族地主势力。南北朝的士族大致可分三个集团：关陇、山东和江南。隋朝继承北周遗业，将相大臣多出身于关陇的豪强大族。北周灭北齐，就把许多山东士族迁到关中，以防止他们阴谋分裂。隋平江南，命陈后主以下的大批南方士族迁居北方。他们拖老带小，行李车马，连绵 500 余里。但是留在南方的还大有其人，